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 “双轨制”经济学

## 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张军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张军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7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  
库)

ISBN 978-7-5432-2634-0

I. ①双…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1978-1992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6420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张 军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3

字 数 285,000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34-0/F·936

定价:55.00 元

## 主 编 的 话

---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陈昕

2014年1月1日

## 再 版 前 言

---

前不久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的邀请，我为学生们做了一场关于个人研究历程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我回忆了自己研究兴趣转变的几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始于1994年，那一年我获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资助，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我到这里访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1990年年底我结识了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短期执教的哈勒根（Bill Hallagan）博士，而他跟我在中国经济改革话题上有很多相似的看法。他本人曾经在拉托维亚访问一年，对激进改革国家和改革后的经济表现有近距离的观察。所以，当他获得美国国会富布莱特基金资助来到复旦大学时，非常希望能与中国经济学家进行交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机缘巧合，我那时候刚刚从伦敦经济学院回到复旦大学不久，便与他相识并从此结下学术友情至今。

我是结束在英国为期一年的博士后项目之后于1994年9月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哈勒根博士为我的到访做了很好的安排。经济系为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的7个月中，我与哈勒根博士反复就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

经验进行讨论，这当中不仅涉及1991年俄罗斯发生的非常激进的转型，而且我们也都认为必须要把上世纪80年代苏联曾经进行的局部的改革和比较渐进的转型经验与教训进行很好的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用经济学最简单的分析框架来刻画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方式并解释两国转型后的经济增长的差异。于是我们陆续写出了合作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第一篇论文“Growth in Industrial Output in Post-reform China: Dual Pricing and Competitive Fringe”直到1998年才正式发表于*East Asian Review* (no. 2, 1—17)上。后面合作的论文还包括“Excessive Entry into the Markets: A Game Theoretical Approach”以及“Starting Positions, Reform Speed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等。其中，后一篇论文被收入美国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工作论文系列中。而且我们还以“改革起点和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为题在《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的首篇位置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期间，我就准备了撰写一本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书。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观察到的改革基本上还是以8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为主，而这一时期的改革典型地表现为微观改革为主，少有宏观层面的改革。事实上，因为微观改革优先而宏观管理的改革大大滞后，导致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无法避免宏观经济层面的巨大波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中央政府在1993年决定推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变革。

基于对中国经济80年代改革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在总结和刻画1978年到1992年分税制改革之前那一阶段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问题上，没有比“双轨制”这个词更好的了。于是我就以《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为题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写作计划。整个书稿完成于1996年年底，至今正好20周年。最初，这本书被陈昕先生看中，作为“当代经济学文库”之一于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社又重印过这本书，并且使用了整个系列的新的封面。

今天看来，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历史，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思潮和政府与新生代经济学家的改革互动气氛也常常被人怀念，但那终究变成了历史。值得欣慰的是，也由于我们20多年前激情澎湃的研究，

2015年10月我与林毅夫和樊纲一起荣获了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而这本书当然也“功不可没”。

这次承蒙出版社的厚爱，决定再版这本书并嘱咐我写个前言，我欣然答应。因为工作过于忙碌，我的这个前言写起来断断续续，本应2015年秋完成，但无奈间拖延至今天。这次再版，我不打算对之前版本的正文做出任何修改，不过，愿意增加一个附录。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的第30个年头。考虑到这个重要的纪念年份，2006—2007年间我利用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和加拿大皇后大学从事研究的时机写作了另外一本书——《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在这本书里，我也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写了价格“双轨制”。考虑到这一章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内容更多集中在对“双轨制”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所发生争议的回忆与当年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考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对本书的一个冗长的“脚注”，因此我决定把它作为本书再版的一个附录，供读者参阅。

感谢长期以来对我的学术发展给予持续支持的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也感谢何元龙先生，20年前，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正是他。我还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先生，是他向我提出了再版本书的希望。他们的智慧和对学术出版的长期支持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张 军

2016年5月23日

# 前 言

---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经济学著作，它的内容从总体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研究“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方面所形成的一些初步的思想，也是对这几年我在国内和国外研究与讲授中国经济改革这一课题的阶段性的总结。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在理论上对传播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人，我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感到无比的幸运。亲身经历并实实在在地观察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也许，面对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经济学家所受到的训练和所掌握的分析方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贵。在所有转轨经济中，中国无疑是最受世人关注的一个案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有义务去研究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转变过程，有责任总结我们在经济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个变迁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和认识的逻辑框架，从而让我们对尚未发生或希望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思想准备，这是经济学家的目标。当然，真正的理论工作者



从来都认为，理论和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理论家可以替代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明智的政治家和千千万万的实干家。

## 写作背景

我为写作本书作了充分的准备。我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在复旦大学师从宋承先教授。自80年代末以来，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制度变迁和产权理论方面的研究。1991年，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形，我的《现代产权经济学》一书在国内首次出版（到1996年3月实际上已经印行了4次）。应该说，这部著作的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它几乎成了一本教科书而受到广泛的阅读。之后，我便着手从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问题。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一项大的研究工程，研究时间的跨度要足够的长，以便我们能从具体的事件中超脱出来进行理论的工作。而我当时能做的也许是运用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从一个一般的层面上来思考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和转型方式的问题，这些后来就成为我1992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后半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曾陆陆续续以单独论文的形式在《经济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和《上海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就在1992年的夏天，我尚未就修改和编辑出版博士论文作出最后的决定，就先取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BC）的慷慨资助再次来到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与上一次在英国学习不同，这次在英国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中，我接触了大量的有关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资料，也参与了不少讨论转型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研讨会。我渐渐放弃了原先设想的在英国继续从事运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博士后计划，决定利用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时间集中从事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证研究。1994年初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家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其中一个标志是，一部汇集中青年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上海举行了一个高级研讨会，包括中国海外经济学家在内的数十名青年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久，我又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慷慨资助客

座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事实上，我几乎是在研究和讲授中国转轨经济问题的紧张节奏中度过在美国的两个学期的。在美国期间，和我共事的哈勒根博士每周都和我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问题，而且我们事实上还幸运地吸引了从事东欧问题研究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不断地向我提供他们所发现的有关中国和东欧研究的论文与统计资料。逐渐地，一个实证研究中国转型经济问题的写作计划开始形成。由于哈勒根博士和我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方式的研究论文，并在我的同事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整理大量的研究文献和统计数据，构思本书的写作提纲，渴望专门写一部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经济学著作。带着大量的文献以及写作提纲，1995年6月我从美国回到上海，于秋季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讲授转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讲授的一部分内容后来以《中国过渡经济导论》为题在上海出版。尽管我在教学和社会活动（包括出国开会）等方面被占去了大量的时间，但我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转轨方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我终于在1996年年底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写作计划。也许和其他作者一样，完成一部著作就像拍成一部电影，总会留下很多遗憾乃至败笔。但我十分清楚，当这部书稿终于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这个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为本书可能出现的瑕疵和错误承担全部的责任。

## 鸣谢

复旦大学是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的地方，我很喜欢“复旦”这个富有朝气、永远年轻的名字。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十年向壁的求学生活，正式成为复旦大学的教师也差不多有十年了。复旦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复旦的校园那样的美丽。复旦大学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有不少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教授。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学生，复旦大学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在复旦大学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学问”和如何从事科学研究的道理，就像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把每一句的第二个字结合起来，那就是“学问”二字，也就是“学会问问题”。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复旦大学给了我机会。

“给青年人以机会”现在正被作为一项政策在复旦大学加以贯彻中。七八年来，我实际上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欧洲和美国度过的。东奔西走，来来去去，我始终得到复旦大学和经济学院的支持与理解。我在这里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届的校长和始终关心我发展成长的人事（师资）部门的领导；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历任院长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我的关怀、鼓励和支持，他们是蒋学模教授、宋承先教授、陈观烈教授、洪文达教授、张熏华教授、伍柏麟教授、洪远朋教授、尹伯成教授和吴慧贞副教授等。宋承先教授是我的导师，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厚功底和渊博的知识，他的治学态度和人生哲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还幸运地与许多年轻的学者愉快地共事，我从与他们的共事与合作中获益匪浅，他们是黄亚钧博士、陆德明教授、姜波克博士、华民博士、张晖明博士、袁志刚博士、石磊博士和殷醒民博士等。

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来为我的研究工作直接和间接提供资助的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英国政府海外开发署、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督教基金等。1996年4月我又荣幸地获得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基金的资助，并容允我拖延至1997年赴伦敦使用这笔资助。这些年来，在研究工作中，我还得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企业发展研究所、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中心、《经济研究》、上海现代经济研究所、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等许多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我尤其要感谢陈昕先生，他积极支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多年来他始终如一地关心和鼓励我的研究工作。在本书于1996年底完成以后，他又积极提供出版的机会，对于他在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表示由衷的敬意。另外，何元龙先生以其出色的编辑技巧为本书增色不少，他还是本书的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对于他的耐心、效率和合作精神，我表示感谢。

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长期以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7岁的儿子哲元（又名“王子”）几乎是与我的学术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

从他3岁起，他便和我一起度过了在伦敦、巴黎、西雅图和旧金山的日日夜夜。他的存在虽然消耗了我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但给了我以极大的快乐和精神的满足。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王小丽女士。毫无疑问，为了我多年的研究工作，她所作出的牺牲是我无法说清楚的。这些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始终与我风风雨雨，同舟共济，既分享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快乐，更为我以及我们的儿子付出了艰辛的代价，这本书里无疑包含了她的心血。

张 军

1997年5月2日记于上海家中

# ABSTRACT

---

It is well accepted that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market reforms have varied considerably among former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Following the onset of the Chinese market reforms initiated in 1978, industrial output rose fairly dramatically. In contrast, the market reforms which were initiated throughou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late 1980s were followed by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output. For some observer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 puzzling. The post-reform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ial output has occurr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reforms depart from traditional prescriptions. Specifically, the early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ackage relied neither on privatization nor on rapid reduction in the role of central planning. Until the 1990s industrial output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as insignificant and, during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the state sector was still operating under a regime of planning where output quotas and prices continued to be administered by central planners.

The debate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n be simplified into two opposing viewpoints. On one side are those who argue that “Big Bang” market reforms will produce more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an gradual/sequenced reforms. The arguments here are based on the desirable attributes of an economy wher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e well defined, held privately, and prices are market determined. Simply put, well define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generate strong economic incentives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their highest valued uses, and market prices provide the best information on what these highest valued uses are. While there exist well accepted arguments abou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market system will fail to perform well, it is argued that the likelihood that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ll operate to improve on market results is low due to the rent seeking activities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Proponents of “Big Bang” market reforms are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puzzle; why have the gradualist Chinese reforms generat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Big Bang” reforms of some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resulted in output declines? The response is that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had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For example, it is argued that production was centralized in the Soviet Union to a much greater degree than it was in pre 1978 China. The relative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is not proof of the superiority of a gradualist reform package, rather, it is only indicative of a starting position more favorable for economic growth.

Proponents of the gradual/sequenced approach to reform argue that the rapid introdu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s will not, in general, generate results that mimic the desirable aspects of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An obvious case is that “Big Bang” reform of state industry will not immediately generate a competitive market if, after reform, the market is characterized by monopolistic practices. While entry over time should operate as discipline to a monopolist, entry may be slow due to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which can be expected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 According to this argument, the proper reform sequencing may be to slowly reduce reliance on the planned, state

sector waiting for entry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o emerge. According to the “gradualists” China’s post reform success is more the result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a gradual reform with sensible sequencing than it is a result of China’s unique starting position.

This book looks at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in the context of dual pricing arrangement developed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in 1980s, and develops a model which is capable of exploring the relative efficacy of “Big Bang” and gradualist reform packages. The model is also capable of incorporating different starting positions and investigating how initial starting points affect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reform packages. This model captures the dual pricing system under which the state firm is subject to planned output quotas and planned prices. Having satisfied the plan, the state firm is free to produce for the remaining market and set market prices. The market behavior of the state firm is constrained by the response of a competitive (price taking fringe). Then, The model is also adapted to reflect conditions in post-reform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We provide some simulations of the effect on output for different reform packages. The elements of the reform package which are considered in the simulation are; the rate of reduction in planned output over time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state industry is subsidized. The simulations also consider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arting positions. Particularly, the simulations illustr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ces in size of the competitive fringe at the start of reforms.

The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book is a traditional dominant firm model adapted so that the dominant firm (state industry) is required to supply output for the plan at planned prices. Having satisfied this requirement the state industry is free to supply “out of plan” output to the market where it is sold at market prices. Thus the model incorporates the idea of dual pricing which is a common ingredient in many reform packages. Following the dominant firm model, state industry sets the market price with full recognition that the competitive fringe (non state industry) takes the dominant firm’s price as given and decides how much to supply at that price. We presented in this book the linear version of the

dominant firm model.

Market demand is:

$$P = A - (Q_p + Q_o + Q_f) \text{ where,}$$

$Q_p$  = planned output

$Q_o$  = out of plan output supplied by the state industry

$Q_f$  = output supplied by the competitive fringe

Total output for the state firm is  $Q_s = Q_p + Q_o$ . The market price is  $P$  and the planned price is  $P_p$ . Throughout this model, it is assumed that  $P_p < P$  which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ence of dual pricing practice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market behavior is independent of  $P_p$ , and, for notational convenience, it is ignored in the model.

For one firm in the competitive fringe, marginal cost is:

$$MC_f = d + q_f \text{ where,}$$

$q_f$  = output for one fringe firm

In the dominant firm model, the competitive fringe behaves as a price taker so the supply curve for one fringe curve is:

$$P = d + q_f$$

If  $N$  is the number of identical firms in the competitive fringe then total fringe supply is:

$$Q_f = Nq_f$$

And the supply curve for  $N$  fringe firms is:

$$P = d + Q_f / N$$

The dominant firm produces planned output and then selects the profit maximizing out of plan output level, given the competitive fringe supply. As in the dominant firm model, the state industry calculates their residual demand curve by subtracting (1) planned output and (2) competitive fringe supply from the market demand. This calculation results in the residual demand curve. Alge-



braically, the residual demand is:

$$\begin{aligned} P &= X - [(X - d)/(Z - d)]Q_o \quad \text{where,} \\ X &= (Z + Nd)/(1 + N) \\ Z &= A - Q_p \end{aligned}$$

The marginal revenue associated with this residual demand is:

$$MR = X - 2[(X - d)/(Z - d)]Q_o$$

In this linear model, marginal cost for the dominant firm is assumed constant at:

$$MC = c$$

The dominant firm (state industry) selects out of plan output ( $Q_o^*$ ) to maximize profits ( $MR=MC$ ) and the resulting profit maximization out of plan output is:

$$Q_o^* = [(X - c)/2][(Z - d)/(X - d)]$$

At this output level, the profit maximizing price is:

$$P^* = (X + c)/2$$

Given this price, the fringe supply is:

$$Q_f = N[(X + c)/2 - d]$$

Several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reform packages and initial starting point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model for simulation purposes.

A. Subsidization of State Industry: Subsidies for state industry have continued for Chinese state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reform period. In addition, Chinese state industry acquires some of its non labor inputs from other state industry at below market planned prices. Finally labor in state industry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a quasi fixed cost in that much of the payment to labor is in housing and other non wage benefits. Taken together, these featur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imply that the marginal costs of production for state enterprise are lower than for fringe competitors. In terms of the model this suggests that